

本书是一部主题鲜明的世界史，始于 1780 年的革命时代，终于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场战争最终破坏了当时的国家与帝国体系。它表明历史的趋向和事件的进程如何能结合在一起，而之前它们一直是作为地区史和国别史而被单独对待的。这揭示了全球政治与社会变革在假定的 1945 年后“全球化”的当代时期开始之前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一方面，世界大事件（如 1789 年或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影响向外传播，并与其他地区发生的大事件汇聚在一起。另一方面，在逐渐出现的工业化的欧洲和美国世界经济“核心区”之外发生的事件，如 19 世纪中期中国和印度的叛乱，又对核心区产生了冲击，塑造了其意识形态，并形成了新的社会与政治冲突。随着世界事件变得越来越相互联系和依赖，这些人类行动开始彼此适应，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相像。本书因此探查了 19 世纪在国家、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生活方面全球一致性的起源。一致性的增加不仅在教会、皇家法院或司法体系这些重要的机构和制度上有所体现，而且在本书所谓的“生活习惯”方面，即人们穿衣、说话、吃饭和处理家庭关系的方式上，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 19 世纪在不同的社会之间迅速发展的联系创造了许多混合而复杂的政权、意识形态和全球经济活动形式。然而同时，这些联系也增强了不同社会中人们（尤其是精英间）的区别感，甚至导致了他们间的对抗。例如，当面对来自新的全球经济，尤其是来自欧洲帝国主义的严重挑战

时，日本人、印度人和美国人日益在自己天生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认同感中发现了力量。用社会理论家阿朱那·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话来说，全球力量与地方力量“互相残杀”又彼此依靠的矛盾在当代人文科学中是广为人知的。¹但是全球与地方、普遍与具体之间在这种模糊的关系之前已有了长期的历史。因此在19世纪，当民族国家和相互竞争的帝国之间的相似性与联系日益扩散时，它们呈现了更明显的特点，同时彼此变得更加敌对。全球变革的显著力量增强了人类社会间外在表现的不同，但这些不同越来越趋于采用相同的方式来表达。

因此本书作者认为，所有地方史、国别史或地区史在某些重要方面一定是全球史，从狭义上书写“欧洲史”或“美国史”已不再可能了。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接受这种观点，这确实令人鼓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布罗代尔领导的法国年鉴学派首先研究了近代早期某种形式的全球社会、经济史。²超越国家和生态圈界限的需要对19世纪来说甚至是更明显的。这尤其适用于欧洲帝国史，既包括俄国这样的陆上帝国，也包括英法这样的海上帝国。研究英国的历史学家琳达·科利（Linda Colley）³和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⁴与研究俄国的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⁵和多米尼·利芬（Dominic Lieven）⁶一直活跃在学术的最前沿，他们努力证明帝国的经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于这些民族国家的创建和形式是很重要的。同时，王国斌⁷、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⁸、王赓武⁹和乔安娜·韦利-科恩（Joanna Waley-Cohen）¹⁰开始以全球史的角度来撰写中国史，他们仔细考察了在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的外表下中国人很早就开始进行并一直坚持至今的海外移民。

什么是“漫长”的19世纪中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和一致性的关键推动力？这一时期的世界史不可能回避西欧和北美不断增长的经济优势的核心重要性。1780年，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仍然是强大的、世界级的实体，非洲和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仍然被当地人所统治。相比而言，到1914年，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处于四分五裂的边缘，非洲已经被欧洲政府、商业公司和大小矿主残酷地征服。从1780年到1914年间，欧洲人从北

非、南非、北美、中亚、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的当地人手中抢走了大量的土地。如果西欧和北美沿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1800 年最多是南亚的两倍、比中国沿海仅仅多一点的话，那么一个世纪后，差距则扩大到 10 倍甚至更多。没有被欧洲或美国直接控制的世界大部分地区是历史学家称之为“非正式帝国”的部分，那里存在着当地人和外来人之间权力的不平等，但仍没有导致直接的合并。

物质上的优势带来了不同程度上的意识形态的依附。欧洲国家间激烈冲突和竞争的社会观念、制度和程序变成了非欧洲国家人民的控制器和榜样。然而，这些人并非西方施舍的被动接受者，也不只是无精打采的西方受害者。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接受并重塑了西方的思想与技术，因此限定了欧洲掌权者统治的性质与程度。在本书考察的时期的开始，世界仍然是多中心的。尽管强大的竞争优势已经转向了欧洲人及其海外殖民者，但东亚、南亚和非洲在不同领域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也仍保持着活力与创新。到这一时期末，随着日本的崛起和欧洲之外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的“领导”地位遭到严重的挑战。因此这一时期的历史不得不证明大量不同和显然矛盾的事情。它不得不全面考察世界事件的相互依赖，同时又要考虑到西方统治的残酷一面。而且它也不得不阐明，相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西方的优势只是部分和暂时的。

本书的结构

《现代世界的诞生》是对世界史的反映而非陈述。第三、四、六章和最后一章按照时间顺序构建了 1780 年至 1914 年这一漫长时期里的世界事件的历史。作者把相对稳定期和全球危机期做了比较，其目的是选择和强调一系列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变革中的某种联系。例如，第三章重新强调了 1776 年后欧洲、北美的革命年代与“第一次全球帝国主义时代”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疾风骤雨般统治之间意识形态上的与政治上的联系。近来对欧洲 1848 年革命的重新解释促进了从相关有利角度来看待中国 19 世纪中期

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印度1857—1859年的大起义等重要事件。第四章把美国内战看作是全球事件，而不只是美国危机。在第六章中，19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排外都在同样的分析领域中被考察，而非像以前那样被单独对待。

这些章节重新强调了这样的观点：民族史和“区域研究”需要更充分考虑更广大世界中的变化。思想与政治运动“跳”过海洋和各国的边界。例如，1865年美国内战的结束使得美国自由派能够为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arez）领导的墨西哥激进政府提供支持，而华雷斯当时正受到法国支持的保守派的攻击。墨西哥激进分子已经获得加里波第和其他革命者的支持，这些革命者一直是反对欧洲权威的1848年革命的英雄。¹¹这种共同的经历导致全球联合阵线的成立，但是全球变革同样也支持文人、政治家和普通人强调不同而非一致性。例如，到19世纪8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和西方商品的影响使得印度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更加意识到自己独特的宗教实践、行为举止和本地工匠的优势。这种不同感本身也及时创建了进一步的全球联系。印度艺术家把当时的日本艺术家看作是唯美传统的继承人，并把他们的风格融合进自己的作品。本书贯穿始终的目标就是把所谓的“横向史”（即联系史）与“纵向史”（即特殊制度与意识形态发展史）结合起来。

因此第一、二、五章和本书的后半部分在内容上主题更鲜明。这些章节考察了一直被历史学家使用的重要的社会概念，19世纪的作家和评论家曾用这些概念来阐述19世纪主要变革的特点。在这些概念中，现代国家、科学、工业化、自由主义和宗教的由来似乎是最重要的。这些章节的目的就是从地区和国别史的范围汇集材料，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变得根深蒂固和被赋予权力的。它们试图提供一种联系和进程的历史，而非简单地认为现代化是一个从占主导的、“理性”的欧洲或美国向外传播的过程。本书再次坚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非欧洲人民及欧洲与美国社会中的附属群体的活动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因此，1870年后欧洲罗马天主教等级制的重建是更广泛的建设“世界

宗教”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也同样发生在印度教、儒教和佛教领域。这不仅仅是类比，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基督教会常常在国内实行合作和创建新的组织，正是由于他们在海外的传教活动中需要团结，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受到了复兴的伊斯兰教和在自己属民中传播的其他宗教传统的压力。

本书的内容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时外交竞争和国际经济变化正面对着承受了空前压力的国家与帝国体系。正如休·斯特罗恩（Hew Strachan）强调的那样，¹²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作为世界体系下欧洲核心区的一场内战而开始，但它明显是一场世界大战。那场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它来源于各种地方危机的汇聚，而许多危机发源于欧洲之外，其爆炸性的力量将在整个 20 世纪回响。

世界史的写作提出了许多有关解释和话语的尖锐问题。在公开讨论之前，通过考察一个特殊领域——人类生活习惯——的一致性的增长，我们将思考其中三个问题。

5

问题一：“第一推动力”和经济因素

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仍然思考着“事情为什么发生了改变”的问题。19 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倾向于认为历史是被大的精神和思想变化所推动的。他们认为，上帝、理性精神或对自由的渴望推动着世界运转。其中一些人相信欧洲基督徒的“文明开化使命”，其他人认为，种族和文明按照竞争、生存和衰落自然法则起起落落。20 世纪，唯物主义对变化的解释涌现出来，引人注目。到 1950 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家都受到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把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看作解释 1750 年后人类事务变化的主要力量。这种观点一直处于中心地位。按照某种标准，可以说 19 世纪关键的历史变化是大多数强大的国家和社会面对城市工业资本主义实行变革的结果。资本家把其收益最大化及占有劳动力的渴望，不仅是西方也是全亚洲和非洲进行变革的无情力量。

在所有英语世界印刷的历史书中，最有力和连贯的著作是埃里克·霍

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四卷本的世界史杰作,¹³ 其中的唯物主义解释, 尤其是《资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 非常明显。然而, 正如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在 2002 年霍布斯鲍姆的自传出版之时评论的那样, 19 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发展并未产生如此之久的影响以至于能直接反映工业资本力量的基本发展。¹⁴ 经济、意识形态和国家的运转不总是同步的, 它们更倾向于互动。这一时期占主导的政治事件——法国大革命——在重要的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就已爆发了, 并且如今很少有历史学家把法国革命看作“资产阶级”的胜利。当然许多律师和“中等阶级”参加了革命, 但他们是贵族和地方议会的依附者, 而并非初期的资本家。甚至在 1870 年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解释, 这是资本高涨的年代), 地主和贵族在大部分社会中也仍然是掌权者。19 世纪晚期是真正的“资本的年代”, 但即使这一时期也不能“简化”为资本。它也是贵族、地主、牧师的年代, 甚至在大部分世界里, 它是农民的时代。

6 面对这些问题, 20 世纪末的一些历史学家把国家与“政府”, 尤其是占主导的西方类型的国家作为其历史剧中的“第一推动力”, 但这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现代国家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与时代重大的经济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它不是严格地由它们决定。此外,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强调国家或政府的兴起仍然留下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现代国家究竟为什么发展? 如果我们记得, 这时期最新的政治工程——美利坚合众国几乎在 19 世纪 30 年代前还没开始工业化, 但它的结构和制度却代表了反对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国家的成功的革命, 那么这个谜就更不易处理了。

本书的主旨并不是要深挖这些深层次的原因, 而是要说明任何世界史都需要设定政治组织、政治思想与经济活动之间更复杂的互动。在这一观点中, 经济当然发挥了基本的作用。地方经济增强的模式甚至在充分的工业化之前也是重要的变革的发动机。第二章指出, 经济史家简·德·弗雷 (Jan de Vrie) 的“勤劳革命”概念能被有效地用于追踪自 1650 年以来发生在全球的许多经济强化形式。整个 18 世纪, “勤劳革命”不断重新安排着不同地区的社会。从华南到马萨诸塞, 资本和劳动力都在努力发挥作

用。小规模的技术革新可以与商品分配和人们物质习惯的改变相匹配。农民的家庭变成了富足的农场主家庭；小店主变成了阿姆斯特丹、马六甲和非斯的市民。他们想要高质量的食品、衣服以及更高的荣誉和地位。

然而即便像本书那样强调勤劳革命的重要性，也不必优先考虑历史的因果关系以证明其他经济动力的合理性。因为勤劳革命不仅仅是生活资料分配方面的残酷变化，用今天的行话来说，它们也是“话语”方面的革命。人们关于欲求的眼界发生了变化，因为与统治阶级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有关的信息已经快速传播了。“中等阶层”的人们想要仿效更加愉悦和舒适的宫廷消费。正是这一系列优先的概念转变赋予了店主们权力，创造了新的劳动力需求，并促使商人们漂洋过海去寻求奢侈品。新的、更加积极的国家，尤其是西欧各国继而利用了这些变化，开始用武装战舰和垄断公司把全球的勤劳革命联系在一起。加勒比地区的奴隶体系代表了最终的、被迫的勤劳革命。

这些社会、经济变化是不平衡和令人不安的。它们揭示出不同群体和社会间的差别；它们激发了对财富、嫉妒和猜疑邻国的热情；它们导致了海外战争、不平等的税收、社会混乱和对现存政府、王室和宗教的质疑。混乱是全球范围的。法国哲学家和阿拉伯中部的宗教导师同样感觉到新的联系带来的冲击及其造成的动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720 至 1820 年间，尤其是 1780 年后，许多地方冲突在全球失去了控制。积极的法国革命式国家自身造就了许多凶猛的敌人。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及毗邻的非欧洲国家，尤其是奥斯曼帝国、中华帝国和德川幕府时的日本，被迫拓宽了自己野心的范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利用和调整新的意识形态，并深入以前通常是自治的社会领域。

革命时期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变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灾难性的”，它们不能仅仅在旧政权的矛盾和冲突或者资本主义单独发展的基础上被预测和解释。关键时刻产生的新意识形态如今赋予了国家力量，形成了一种“象皮病”。精英们为由此带来的 19 世纪早期的很多秩序和合法性问题争斗不休。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事实上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确立经济一致性

之前已达到了全球范围。因此，资本的兴起本质上不是一种力量，它在由对权力、所有权、正义和尊严更广泛的渴望所创造的社会生态中扩散。

事实上只是在大约 1840 年后，朝向工业化复杂而无情的转变才开始在全球范围“进行”了。当时另一系列危机震撼了世界秩序，包括欧洲 1848 年革命、亚洲大规模叛乱和美国内战。统治阶级通过促进工业化或至少为其提供框架来竭力稳定社会秩序。工业化为国家和军队的新武装提供了新资源。正如霍布斯鲍姆猜测的那样，资本的时代到 19 世纪 70 年代真正到来了，但掌握资本的人只有通过国王、贵族、地主及在边界明确的新民族国家的政府机关里任职的官僚分享权力才能获得地位与尊敬。正如第九和第十一章竭力说明的那样，资本的时代因此也是一个等级长久存在和宗教变得更有力量、更被需要的时期。

因而从最广的意义上说，历史的发展似乎由经济变化、意识形态构建和国家机制所构成的复杂的四边形的合力来决定。世界经济一直未简单地“先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而发展。这些领域在不同的时间里不同程度地相互影响。因此在一些时期，国家及创造国家的强大人民是历史变革的“驱动力”；还有一些是像 1815 至 1850 年间那样变动的时期；而在另一些时期，重要的经济重构最终决定了政府及其意识形态的方向。正如不同的时期变化不同一样，这些因素的平衡也随整个大陆不同社会的变化而改变。

问题二：全球史与后现代主义

然而撰写世界史的第二个问题来自于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对以上这种方式的极不认同，这些历史学家倾向于反对所有关于资本、国家甚至意识形态变化的“宏大叙事”。大约 1980 年后，一些历史学家受到所谓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思想趋势的影响。¹⁵持这些论点的学者常常反对宏观的比较史或所谓的“元叙事”，他们认为这些宏观史是与他们描述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进程串通一气的。以上关于国家和资本的叙述将构成这些学者的两个目标。以这种方式撰史的历史学家竭力恢复弱势群体的“去中心

化”叙事。这些弱势群体被认为是附属于欧洲与美国的男性资本家的，而这些资本家书写了当时的政治演说和政府备忘录。结果他们的声音被系统地排除在后来历史学家所构建的世界史的宏大叙事之外了。一些历史撰写中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因而创造了一片紧张的领域。随着“全球化”变成当今最时髦的概念，对世界史学术的和大众的需求似乎急剧膨胀。然而后现代主义者严厉批评了世界史撰写的一些基本假设，包括把人类的经验同质化和抹杀“弱势群体”的历史。¹⁶

人文科学为什么要采纳同样的方法论是没有理由的，这样的争论很多。当不同的撰史类型一起百花齐放，历史总是很兴盛，此时“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受到了“谁这么说了”和“这意味着什么”此类问题的挑战。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时一个仍旧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受到了欧洲和北美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的挑战。不过有件事情是清楚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历史学家甚至在叙述穷人、附属的妇女或“土著”的经历时，也常常参考国家、宗教和殖民主义等宏观现象，而且有时他们认为理所当然该这样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论著通常因此掩藏了自己潜在的“元叙事”，从其由来和含义上说，它也有政治性和教化的色彩。例如，许多这样的论述假设，如果像一元性的国家、父权制或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这样占优势的历史发动机不是如此强大，一个更好的世界可能会发展起来。因而所有的历史，甚至“碎片化”的历史也是绝对的普世史。因此撰写世界史有助于揭示很多掩藏的元叙事，当原因有分歧时尤其如此。事情为何变化总是历史学家优先关注的问题，由于这一原因，在世界史的层面考虑资源和战略、占优势的群体与其支持者之间的冲突以及考察无历史的人们的经历一样都是很重要的。

这并非认为脱离历史创造主要中心的个人与群体经历无足轻重。宏大叙事总是由边缘构建而成，反之亦然。尤其在19世纪中期前，“边缘人物”位于历史的中心是很普遍的。游牧部落战士变成了帝国将军；庸医变成了科学家；舞女变成了王后。人们很容易就穿越易变的地位和民族的边界，历史的结果保持着开放性。当然，仅仅坚持资本主义、现代国家或民

族概念的兴起掩藏和排斥了很多关于历史变革真正有趣的东西。然而很难否认，甚至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中也无人否认，变化的力量在“漫长”的19世纪对一致性的重要性。

当然在1914年，异端、罪犯和流民仍然到处可见。现代基督教的胜利甚至在欧洲的中心也受到兴盛的唯心论和秘密的巫术异教的挑战。正统伊斯兰教的兴起也受到一种四处弥漫的模糊性的挑战，这种模糊性使得印度教徒、佛教徒或非洲部落的巫师与穆斯林信仰者被允许在同样的神殿祭拜。新的权力中心大量产生，尤其是强大的有组织的劳工集团，否认了现代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胜利。而且这些不可预知的和非标准化的人类生活和思想正日益被共同的政府特征所标记，它们深受有关民族和国际资本市场运作的共同思想的影响。预言家和唯心论者开始使用印刷机，同时有组织的劳工的领导者像大企业那样保持着预算的平衡，并更新自己的备忘录。因此本书作者并不认为对社会碎片或弱势群体的研究与对构建现代性宏观进程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任何矛盾。

问题三：持续的“现代之谜”

“现代”一词用在本书的标题和所有当代的人文科学中，因而现在值得直接提出“现代”这个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S. N. 艾森施塔特(S. N. Eisenstadt)¹⁷和其他人用这个词来表示对全球发展的控制，这些全球发展联合起来，在人类组织和经验中创造了一种他们称之为“现代性”的后续变化。他们所考察的这些变化曾影响了许多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包括伴随着城市化而来的小的核心家庭对大家庭的取代，还包含了工业化、个人政治权利的观念、世俗主义和假定的宗教精神的衰落。他们的模型很多都建立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写于50年前的那部开创性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上。韦伯脑里总是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影子，尽管他强调意识形态变化在理论中的独立作用。结果这一时期艾森施塔特和其他自由派作家的编年史与

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著作有大量共同之处，他们都趋向于把现代化的起源定位在 16 世纪，但也把 19 世纪看作关键阶段。他们也都喜欢把西方作为所有全球变化的源泉，而非西方仅仅是最终将要“奋起直追”的被动者。

到 20 世纪 80 年代，“现代化理论家”受到了大量相互敌对的派别的攻击。人口统计学家对从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的思想变得很谨慎；经济史学家开始怀疑人类发展“需要”通过工业化阶段的观念；社会学家援引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或美国福音派基督教持续扩展的例子来挑战世俗主义胜利的思想。大约 1980 年后，学者们开始谈论“多元的现代性”，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性可能很不同于塞内加尔人或印度尼西亚人的现代性。当然甚至早在 19 世纪，德国、俄国和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已在争论着同样的问题，讨论着“自己的现代性”。到 21 世纪的前 10 年，这一问题仍然令人迷惑不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现代化”，他强调感官和情感的愉悦及对魔幻的理解，这与中产阶级个人主义仍占主导的思想相矛盾。同时，其他的社会理论家，如著名的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¹⁸、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¹⁹和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²⁰坚决支持“现代之谜”这一人类巨大进步的真实性。

首先，本书接受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是“认为你是现代化”的思想。现代性渴望“跟上时代”，它是演化和借鉴的进程。似乎难以否认，在约 1780 年到 1914 年间，越来越多的人判定他们是现代化的（或者说他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中），而不管自己是否喜欢。18 世纪的苏格兰和法国哲学家相信，大量以前的人类思想能安全地被扔掉。到 19 世纪末，技术现代化的象征——汽车、飞机、电话——都戏剧化了这种感受。到 1900 年，许多亚洲和非洲的精英同样开始相信这是一个习俗、传统、父权制、旧式宗教和社会正在腐化并应进一步被销蚀的年代。另一方面，少数思想家开始谴责这些发展，尽管他们同样强烈地相信现代化正在泛滥。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19 世纪之所以是现代性的年代，正是因为控制社会秩序的、相当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认为如此。它也是现代化

11

的年代，因为全世界贫穷和依附的人们认为他们通过采用这种神秘的现代性的标志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和生活机会，而不管它们是怀表、雨伞还是新的宗教课本。

这种陈述并不意味着 19 世纪前的人们从未感受到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变化。他们觉察到了，但是他们通常以下面两种方式来解释和描述这些变化，这并不表示世俗的人类事务中相同的进步是现代化思想的本质。第一种方式是，这些早期的评论家通常把人类社会中的变化理解为“革新”。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对古典的完美学习正在恢复，尽管他们不断改变人们理解历史和以新的印刷媒介传播思想的方式。同样 18 世纪的中国学者认为，早期统治下虔诚而博学的世界正在当时清王朝卓越统治的底下得以恢复，尽管清王朝的统治范围比早期王国的范围要大得多。

人们思考人类历史主要变化的第二种方式是千禧年模式。有这种感觉的人们相信，超自然力量或上天已通过某种方式渗透进人类历史，带来了一个具有信仰、美德或预言的新时代。这与向现代性进行世俗转变的观念不同，并困扰了约 1760 年后的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这两种早期的思想方式持续到 19 世纪，为现代化的思想注入了自己的特色。实际上，这一时期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这些感觉全部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例如，科学的、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抱有重建人间天堂的思想。同样，满脑子旧意识形态的、坚定的千禧年领导者，如 19 世纪中期的太平军，却努力获取象征现代性的炮舰和电报线，因为它们也是实用的工具。对现代性的渴望确实有些新鲜。

然而，说某些事情是如此仅仅因为过去的人们这样认为，对历史学家来说肯定并不充分。公开陈述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文本之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趋势在什么程度上能证实被设计成现代化的东西在这一时期正在形成？本书作者认为，当时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彼此间的联系是如此深刻，以至于这一时期能被合理地描述为“现代世界的诞生”。它包含了民族国家的兴起，要求权力集中或者忠于民族团结，同时伴随着全球商业和思想联系的大规模扩张。工业化的国际传播和新型的城市生活与这些深刻的发

展融合在一起。所有这些趋势的融合实际上指向了人类社会组织一个重要变化，变化的范围和规模戏剧性地扩大了。现代性因而不仅是一个进程，也是一个起于 18 世纪末，并以不同方式延续到现在的时期。

那么，这个现代性诞生于何处？19 世纪的思想家倾向于主张社会几乎就像活的生命体一样不断演化成更复杂的组织。西方这些更复杂的社会将因此幸存，因为它们是最“适合”的。本书作者认为，一些西方社会因它们从事贸易、发动战争和公开讨论政策的方式而暂时保持着竞争的优势。然而这些不是天生的优势，它们是偶然的、互动的和相对短暂的。欧洲之外的国家和社会迅速采纳了新的政治与社会行动。因此，本书通过表明全球许多不同的机构和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赋予其权力从而把“现代性的革命”相对化。这样，中国旧式的家族企业就与汉堡或纽约绅士派头的资本家一样重要，它们带来了在中国沿海和东南亚的世界贸易的扩张。希望回到先知时代的西非伊斯兰教的教师为本地区带来了法治和书面语。向现代性的转变发生得多少有点早，最初在西欧及其北美殖民地尤为强大。1914 年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抓住了共同的现代性，而不仅仅是西方的模仿者。西方一度既是现代性的楷模，又是其控制者。到 19 世纪中期，全球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控制者和楷模，其中日本某种程度上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现代性是最重要的。

因而在本书涵盖的 140 年时间里，全球众多社会变得更加一致。当然类似的变化进程已持续了千年。世界宗教的传播本身带来了朝向一致性的重要转变，尤其在生活习惯方面。然而在约 1750 年后，社会组织和宗教热望的范围可能在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变得更广阔了。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更迅速的交流、更大的政治实体、更有雄心的“文明”意识形态都为这种变化提供了动力。同时社会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层次更多，社会间财富和权力的差距变得更加明显。这就是许多不同社会中的人们以诸多不同的方式理解“现代化”的现象。这些重要的陈述为一种分析史提供了起点，这种分析史设法把政治、文化和经济变化结合在一起，揭示它们彼此如何影响，但并不把其中任何一个看得高于一切。

12

适应标准：生活习惯

13

本节现在举一个一致性的明显例子：穿衣和行为举止。当然，即使人们穿衣和行为的方式相同时，他们也能思考和相信完全不同的东西，然而在这个领域创造一致性至少对那些在公开场合以相同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人来说是一种强烈的需要。1780 年，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的衣着类型非常不同：中国是紧身長袍，法国是绣花双排扣长礼服，太平洋和非洲部分地区是仪式化的便服。到 1914 年，大量重要人物无论住在哪里，在公开场合都穿着西式服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新日本的领导人都戴着大礼帽，穿着黑色的大礼服，这一装扮在 19 世纪早期英国和北美福音派基督教复兴时深受欢迎。



图 1 穿着一致：穿着西式服装的日本妇女在辛格缝纫机边上缝纫。19 世纪日本画。

这种严肃的举止表达了责任和自律，不同于旧贵族男子和当时妇女衣着奢侈、复杂。它表明了对决斗和狂欢的盛宴这样行为的舍弃。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对风格鲜明的西方服装的采纳上，也体现于“非西方”或混合类型的服装中类似的一致性的增长中。在中国和日本，服装改革运动努力为长袍与和服的制作与穿着提供范例。在穿着上日益增长的一致性再次伴随着对所有色情和犯罪行为的阻止。例如，印度的改革者竭力阻止人们在胡里节期间公开唱下流歌曲。

当然，这种一致性是以一种被巧妙调整过的姿态出现的，因为人们因各种原因仍然希望突出自己的独特性。一致性并非同质性，它意味着调整现实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创造相似性。从悬挂于奥克兰和新西兰国家画廊的墙壁上的19世纪晚期毛利人酋长的画像上仍然能看到他们多样化的仪式性文身，但好几位酋长穿着黑色外套，戴着白色的蝴蝶结领结（图2）。美国印第安人战争中伟大的酋长杰罗尼莫在照片中穿着套装和夹克，手中拿着来复枪，向战士那样摆出特别的姿势。在其晚年，他就靠卖这样亲笔签名的照片谋生。²¹

14

军装也日趋一致，只是在内部形式上有所调整。日本武士、奥斯曼守卫宫殿的禁卫军或奥地利的胸甲骑兵所配备的加了衬垫的盔甲和金属头盔在一个世纪内开始在全球被单调的制服所代替。其中典型的是英属印度兵称之为“卡其布”的暗褐色服装，这为1899—1902年英布战争期间的英国士兵躲避狙击手的子弹提供了保护。同时所谓精英人士的传统服装自身更趋一致。埃及、阿尔及利亚和马来亚的改革者戴着奥斯曼的毡帽，这是对西式帽子的采纳。对伊斯兰祈祷者来说，这仍然是合适的，它制作简单，避免了完全代替传统的头巾。

15

穿统一服装的趋势在工人阶级、农民和下层人中并不明显。历史学家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对革命时期²²巴黎贫穷的死者的研究表明，他们穿着不同款式和不同时代的零碎、废弃的衣服或多次修补过的服装。1900年，大部分穷人仍旧不能穿太好的衣服。然而工厂条件、社会改革和宗教运动的影响已确保在公共领域的人们开始穿得越来越相像，而不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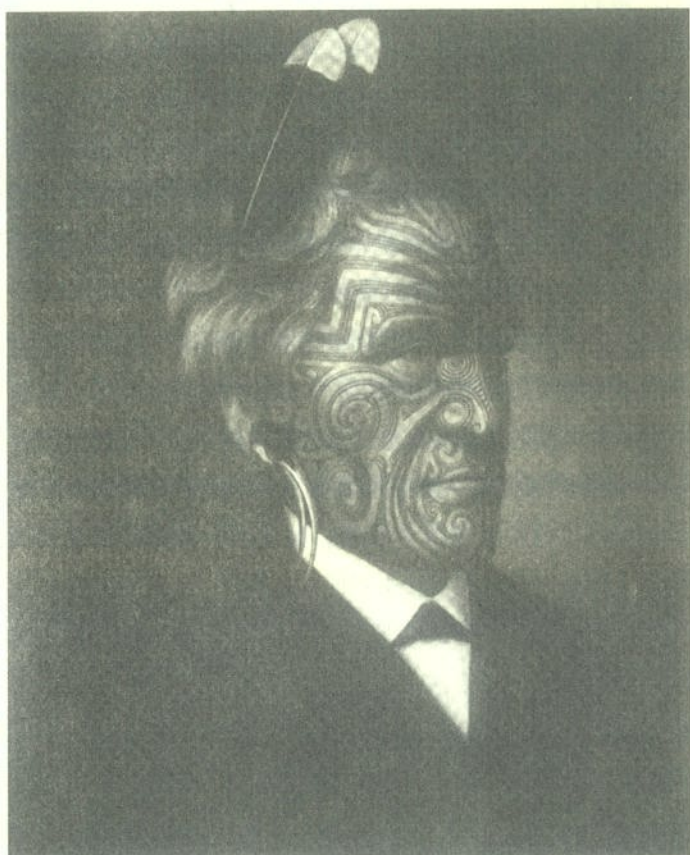


图2 仪式与个人主义：新西兰普伦蒂海湾那该特兰奇部落的首长富加德穆图，戈特弗里德·林道尔画，1880年。

地区和文化的差别。皮鞋、布帽、衬衫和长裤开始取代1780年盛行的裙子、腰布、睡衣、和服和罩衫。工人阶级地位的统一标记开始传播到非洲、南美和印度的采矿工人中。相反，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太平洋和非洲，殖民者和殖民管理者通过坚持让本地人保留“本土服装”，特意为非白人标记了低下的种族和公民地位。例如，在尼亚萨兰的英国文职官员反对非洲人穿鞋。但是这种法律上的强制本身忽视了旧的穿衣习俗资

源的丰富性，只不过强加了一种奴性的统一。

上层妇女的服饰仍然没有统一到非常相似的程度。许多男性改革者提议为妇女改革传统的服装，但并非改成西式的。现代性既是危险的过程，也是危险的渴望，它被认为更适合男人而非女人。在许多社会，希望妇女局限于家庭中，此时甚至比 1780 年更严格地把女人和男人的世界及事务区分开来。家庭主妇的思想本身是公众一致性的产物。妇女穿着装饰性和不实用的衣服，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裹脚与欧洲人使用紧身胸衣非常相似。不过即便对妇女而言，向一致性发展仍然是大势所趋。1780 年，对从孟加拉到斐济广大地区的许多妇女来说，端庄就是要袒露胸膛。到 1914 年，基督教传教士和当地的道德改革家确定裸露的胸脯是与下流联系在一起的。这本身是对生活习惯的一种特别的颠倒。在穆斯林世界，伊斯兰的波卡（burkah）完全遮住了穆斯林妇女的身体，它变得日益流行。波卡常常被今天的西方错误地看作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标志，但实际上它允许妇女从家庭的隔离中走出来，参与有限的公共和商业事务，是很现代的服装。因此，即使坚持传统，人们仍然能看到全球日趋集中的标志。

朝向一致性的趋势某种程度上是由时尚和广告带来的。制造业的传播和西欧、美国海外贸易的扩张推动了共同时尚的扩散。但是国家及其代理人的行动²³和对现代性更普遍的渴望与这些经济需要同样重要。一致性正如在工业和帝国扩张领域显示的那样，体现了在自身渴望方面的思想变化。例如在 1894 年的日本，新的明治政权为官员定制了西式服装，维护了其在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地位。甚至在美国这样管理松散的社会，受尊重思想也传播到地方法院体系的管理上，这逐渐使得须发斑白的地方法官开始穿着正式的绅士外套出现在法庭上。穿着的一致性显示了官僚程序一致性的外在表现和可信赖与受尊重的内在标志。

不是每个人都欢迎一致性的增长，进程的本质总是相互矛盾和竞争。西方人讽刺“土著人”模仿他们，²⁴然而文化民族主义者却反对这种对外国人的奴性的模仿。一位奥斯曼的穆斯林保守主义者在 19 世纪 80 年代说：“在欧洲所见的任何东西在这里都能得到模仿，这样的谬误竟然成



图3 具体化的标准：穿着西式服装的美洲印第安妇女，第49次横跨北美的皇家工程师摄，1870年。

为一种政治传统。例如，通过同时引进俄国的制服、比利时的步枪、土耳其的帽子、匈牙利的马鞍、英国的宝剑和法国的训练，我们创造了一支对欧洲进行拙劣模仿的奇特的军队。”²⁵ 他可能还要补充这一点：世界闻名的、最典型的奥斯曼毡帽通常在奥地利生产，直到1908年遭到抵制后，叙利

亚的驼毛毡帽生产才得以恢复，这真是一种讽刺。²⁶

身体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史学家考察国家的影响和社会规则的场所，这些社会规则在 19 世纪成为了全球标准。²⁷除了穿着的一致性外，另一个重要的生活习惯是计时。早在 17、18 世纪末，小型时钟或怀表已经传遍欧洲及其殖民地。实行奴隶制的种植园被主人挂表的计时铃声所控制，在那里，还有许多控制劳动力的方法被残酷地发明出来了。到 1750 年，北美 13 个殖民地和英国、北德意志及荷兰这些富裕的欧洲地区的小农场主和熟练工人已能买得起手表。这些钟表所显示的时间在全世界也日趋一致。俄国向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帝国主义扩张要求地方时间必须调整。随着 19 世纪的进程，附属的非欧洲社会也需要更精确和同步的计时。电报的传播使得时间体系的标准化在全球及中国和印度这些人口众多的社会中成为可能，在那里，当地的时间体系到 18 世纪末还很盛行。在印度和中国的沿海城市，地方显贵开始修建大的钟楼来调整集市和政府机关的节奏，而过去他们通常把钱财投给寺庙或清真寺。

到 1900 年，另一种生活习惯——人类的语言也逐渐彼此相像。西方的官员、传教士和教育家想让语言的规则变得更加明晰，而且最好遵循西欧语言的模式。本地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希望自己的民族语言也是如此。例如，正在形成的印度共同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句子结构开始遵循英语的模式。甚至新形成的反映了移民、奴隶制和全球化的混合语言——克里奥尔语、斯瓦希里语和皮钦语也有了自己的语法规则书。随着公共人物在全球的政治、宗教和科学领域站稳了脚跟，他开始需要一种公共的声音。从费城、罗马到京都、斐济的政治演说和布道采取了同样的形式，这些模式不仅有基督教的、西方的，也有反映先知生活的穆斯林布道和形式上讲述佛祖故事的木刻板印刷。

18

全球趋同的另一种影响可以在起名的习惯中看出来。随着印刷媒体和宗教、文化改革运动传遍整个社会，个人的名字变得更加标准化，这就消除了地方起名方式的差异。国家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因为管理者为了征税和征兵的目的，需要不断检查和审理人们。不过这也并非简单的强制，普

通人需要利用国家的形式来获得本地的救济、教育或移民的机会。宗教信仰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以伟大的牧牛神诃里什那（尤其是他的化身或再生形式拉姆）的属性来命名。在亚洲和非洲的伊斯兰教社会，先知及其妻子阿以莎（Ayesha）的名字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作为一种更加标准化的伊斯兰教惯例被导师和政府再次宣传。因麦加和麦地那朝圣而产生的全球联系使他们的努力得以加强。奴隶制和基督教福音这两个孪生的制度传播了欧洲“基督教”式的名字，当然这些名字以前大多是犹太教的，到19世纪传到了成百万的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和太平洋岛屿的居民中。同时，政府和法院因公务的目的要求每人有一个标准化的个人和家族姓名，这导致了一些反常的结果。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意味着成百上千的人被叫做“约翰森”（Johanssen）和“克里斯蒂安森”（Christiansen），然而在缅甸，以生日来命名的惯例意味着大部分人以缅甸语的星期日期和少量占星的符号来起名。

世界不同地区人们的食物也变得很相似。小麦面包和牛肉成为现代早期英国和北德意志的标准膳食，这一食谱后来输入到了英属美洲殖民地及后来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与传教士接触或开始住在欧洲城镇的本地人接受了西北欧的食物，部分因为这些食物在市场上可以买到，部分因为他们被迫适应其新主人的标准。19世纪晚期，随着亚非改革派的政府开始掌权或西式的精英开始发挥影响，适应新的食物标准的压力出现了。日本人开始吃牛肉，而过去佛教的信仰禁止他们这样做，因此出现了牛肉寿喜烧。这被认为将增强他们的种族根基，帮助他们控制西方的帝国主义。圣雄甘地为强健印度人的体魄也曾暂时考虑过肉食，他认为印度人被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坏习惯搞得太过“颓废”了。不过后来他和同时代的人开始拒绝这一想法。尽管如此，印度人仍然很快就适应吃西红柿、马铃薯和红辣椒，所有这些食物都来源于美洲，并在16、17世纪被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征服者传遍了世界。

最后这个例子进一步提醒我们，这不仅是一个单方面的采用西方食物或生活习惯的问题。帝国和商业扩张在世界不同的社会中创造了多边的联

系，而这些社会正日益走向更大的一致性。例如，18 世纪的加勒比海人和美洲奴隶以亚洲的白米饭为食，并穿着印度的棉织品。西非的首长也很喜欢从印度来的印花布。在亚洲商业和大西洋奴隶制种植园体系之间的这一联系是由欧洲的扩张所创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的织工和非洲的企业家日益成为商业中的积极力量。

到 19 世纪末，在运动和休闲领域的一致性得到进一步的表现。许多早期游戏随意而非正式的特性被简化为秩序和规则，如今日益被世界团体所认可。甚至足球、橄榄球和板球这些英国输送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精粹运动似乎也被打上了对锻炼身体有强烈愿望的印记，它们在战场上和工厂中都可以被看到。曲棍球和马球这些从亚洲传到西方的运动也放弃了最初友好混战的外表，而变成了有秩序的竞争。同时，法国人守纪律、有秩序地做饭和吃饭及文雅外交的模式，德国人科学和人文知识适当分类的观念以同样的轨迹传遍世界。

从外部建立联系：交流与复杂性

生活习惯和个人认同的外部标记上日益增长的一致性在思想层面得以反映。由经济和政治力量所产生的思想和话语体系开始在全世界趋于一致。19 世纪被称作“工业和帝国”的年代，也是全球交流的年代。图书出版业在全球大规模扩张。那些识字率不是很高的社会对交流的印刷形式很敏感。欧洲并非总是处在最前沿。1800 年，加尔各答出版了比圣彼得堡和维也纳更多的印刷物。1828 年，据估计当时全世界出版了 3 168 种报纸，其中几乎一半出自英语国家。但在 1831 年，奥斯曼的《箴言报》可以与伦敦的《泰晤士报》相媲美。到 1900 年，报纸的总种类达到了 31 026 种，其中许多的印刷量达到了成百上千份，其中包括了印度的 600 种、非洲的 195 种和日本的 150 种。²⁸如果我们记得人们乞讨、借阅和偷窃过大量报纸，全球标准化信息的这种几乎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就能得到理解了。在一些社会，人们为文盲读报；在另一些社会，抄写员则把报纸变为

20

大量的手稿形式。

随着 1863 年欧亚海底电缆及 1866 年两条大西洋电缆的开通，电报变成了一种国际体系。铁路、汽船和后来的电话使得交流的速度革命化了。不可否认，在印刷和电报出现前的亚非社会，交流是复杂的，但新的信息密度使得共同思想前所未有的传播成为可能。现代民族主义是法国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战争的产物，它本身在 1850 年后的那一代人中全球化了。爱尔兰、印度、埃及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通过电报线路互相通信，并在巴黎、东京、伦敦、旧金山和上海会面。科学和医疗的思想以同样的速度传遍世界。

这一论点当然不应被应用得太广。仔细的检查表明，表面的相似性和双方的可译性常常掩饰了本质上的重要区别。因此，朝一致性日益增长的趋势从结果上看是竞争的、局部的、不确定的，而非一种同质性的全能力量。甚至在 1880 年，尽管献身于自由这一概念、表达着明显相似的哲学的派别在大西洋两岸遥相呼应，但美国人对于“自由”也有着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中，宗教一致性通常意味着共同的宗教仪式，而非基督教教会有时寻求的教条上的一致性。尽管如此，我仍然要提出，如果只是因为现在这些信仰更容易彼此区分，那么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似乎在 1914 年比 1780 年更像基督教。与此同时，世界的“宗教”代表曾在 1893 年芝加哥召开的著名的世界宗教大会上会面和交谈。他们彼此间说的话可能不比这一事实重要：曾经包含很多权利、萨满教式的习惯、仪式和古代真理的传统如今通常能被归类为“宗教”，它们有着自己的利益圈和某些相似的特点。

贯穿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世界社团中内部复杂性的增长，这些社团为外部的一致性而从内部发展了这一趋势。这种运作的复杂性很不同于旧秩序中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到 19 世纪末，大部分主要的社团有着广泛的专业和职业，有自己的培训和团结仪式。这种协会如今做了更多的社会“工作”，比由亲戚关系和婚姻创造的团结效果更好。政府管理在某种方式上与军事权威分离了，但在 1780 年的中国和欧洲之外的大部分地区却并非

如此。连士兵仍有很大影响的中东伊斯兰教社会都创造了民事管理团体，他们多少介于旧社会中的两大权威——军队和宗教人士之间。一种独特的法律职业出现在大部分殖民地、中国的通商口岸和日本，在那些地方，一个世纪前，法律争论是由宗教官员和各种由家庭各自雇佣的能言善辩的中间人处理的。医疗体系已成文化和规范化。甚至亚洲、北非和中东医疗实践的传统方式也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合格的行医者。世界正日益被一系列分散而又相互联系的专门技术所控制。

在经济生活领域，经理、会计和保险商在所有主要的城市中心都存在。管理与所有权和市场营销广泛分离了。1780 年还局限于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金融投机者在上海、德黑兰和长崎出现了。对普通人来说，工作本身变得更加专门化了。尤其是在季节性的农业劳动和城市工作之间的千年古老联系在很多工业化世界的主要城市中因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变化而被打破了。事实上，一种国际阶级结构正在出现。矛盾的是，这种更大的专门化却产生了一致性的效果。统治集团、专业人士，甚至不同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看起来越来越相似，他们承受了同样的压力，并开始拥有同样的渴望。汇聚、一致和相似并非意味着所有这些人以同样的方式思考或行动，不过至少他们能觉察和阐明打破了民族国家界限的共同利益，尽管他们仍深受其影响。

为了考察这些重要的趋势，本书把 18 世纪中期的世界作为一个基点。这并非表明世界是静止的或狭小的，相反，变革和全球化的强大力量作用于人类社会已有几个世纪了。这只是一个由旧体制和早期社会组织构成的世界，因为人们后来才明显地把它与自己的时代区分开来。然而，从这个时期开始，以上列举的变革的力量开始戏剧性地加速，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历史学家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第一章广泛地考察了 18 世纪中期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生活。第二章继续说明全世界物质和政治生活的发展如何开始动摇 1780—1820 年的世界危机开始前的这些模式。